

生态立法的价值诉求

宋向杰

(厦门大学 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

西南林业大学,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 立法价值是生态法构建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生态法构建的过程中, 立法者应该从关注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共同利益出发, 确定符合生态保护的立法理念, 确立以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生态和谐观、维护人与自然生态秩序的生态安全观, 以及兼顾公平和安全的生态效率观的立法价值。

关键词: 立法价值; 生态和谐; 生态安全; 生态效率

文献引用: 宋向杰. 生态立法的价值诉求[J]. 生态经济, 2012(8): 188~190, 195.

中图分类号: D922.68 **文献标识码:** A

The Value Demands of Ecological Legislation

SONG Xiangjie

(Law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24, China)

Abstract: The value of legislation cannot be avoid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law.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law, legislators mus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human society and the ecosystem, and confirm legislative concept fitting in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stablish firmly the values of legislation of ecological view of harmony which equally emphasizes human interest and ecological benefit, the view of ecological security, which conserves the ecological order of human and nature,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view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of justice and security.

Key words: the value of legislation; ecological harmony; ecological security; ecological efficiency

近些年来, 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出现, 不少环境法的研究者积极主张生态法的构建。学者们从法律概念、法律关系、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以及法律责任等层面探究了生态法的构建。然而, 虽然生态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 但作为对法律体系构建具有评价功能的立法价值, 学者们却鲜有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诚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言: “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的、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 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标准。”^[1] 同时, “任何立法, 只要是为了达成某种目标、解决一定问题, 无论是民间立法还是国家立法, 也无论是议会立法还是行政立法、司法立法, 都会涉及到立法价值的问题。”^[2] 因此, 环境法的修改或生态法的构建离不开立法价值的研究。笔者认为, 当前学界对生态立法价值研究无法满足环境法修改或生态法构建的需要。而事实上, 生态法的构建赋予了生态立法价值以更多的内涵。因此, 在生态法构建的过程中, 立法者应该从关注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共同利益出发, 确定符合生态保护的立法理念, 确立以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生态和谐观、维护人与自然生态秩序的生态安全观, 以及兼顾公平和安全的生态效率观的立法价值。

1 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生态和谐观

生态法是“为了达到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目, 并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 调整人们在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保护自然和法人的生态权利及合法利益方面所产生的生态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3]。因此, 从生态法的根本属性来看, 生态立法要求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强调生态利益的同时要考虑人类的利益, 从人与自然的整体结构和价值出发, 寻求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和谐发展。质言之, 生态立法诉求一种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生态和谐观。

从思想渊源上看, 中国古代早已有类似于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生态和谐观的思想。由儒释道合流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兼顾人类与自然利益的“天人和諧”的思想, 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天与合一”、佛教的“人境无碍”与“众生平等”。“天”在某种意义上即为自然, 因而, 儒家“天人合一”以及道家“天与合一”无疑都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佛教“人境无碍”的“境”, 本意为境地、境界, 即天地或自然之意。自然而然, “人境无碍”意为人类与自然相通无碍。既然相通无碍, 自然和谐共处, 和谐统一。

作者简介: 宋向杰(1973~), 男, 江西会昌人, 博士生, 讲师, 研究方向为法理学、立法学。

西方传统文化总体上是强调天人相分,并相信只要发展和运用人的理性,就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是,随着生态问题的突显,愈来愈多的西方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尊重自然与敬畏自然的重要性,这些思想渊源包括法国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思想、美国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美国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著作中折射的尊重自然的思想以及美国罗尔斯顿环境伦理思想。“敬爱生命”的思想要求人类善待一切生物,要给予地球上所有生命善意。“土地伦理”的思想要求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上,向人类环境延伸,因为“与土地的和谐就像与朋友的和谐,你不能珍视他的右手而砍掉他的左手。”《寂静的春天》以平易的文字,生动的笔调描述了生态危机的严重危害性,作者要求对所有生命的关怀和尊重;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思想认为自然存在独立价值,即使所有意识突然消失,自然本身价值也将留在自然界中^[4]。

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生态和谐观具体包括代内生态和谐、代际生态和谐以及种际生态和谐。代内生态和谐要求人们在改造生存环境的同时,应该维护好人类的生态环境,以保证同代人享有的生存环境的权利。然而,人类对生态资源的需求性,以及生态资源在各个国家(地区)分配不均固有的天然性,必然使生态资源在国内不同地区以及国家之间从天然分配向人为分配转化的再分配。通常而言,生态资源的这种再分配使同代人之间横向和谐呈现两种表现:一是国内同代人之间的和谐,另一是国际同代人之间的和谐。这是因为自然环境资源的再分配发生通常首先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之内发生,再发生在国家之间。但无论是国内同代人之间的和谐,还是国际同代人之间的和谐,都要求人们维护好人类生态环境,以保证同代人享有的生存环境的权利。这种维护要求从本国或地区做起,关注本国或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损害当代人共同的生存利益。

代际生态和谐的内涵源自于美国国际环境法学家爱蒂丝·布朗·魏伊丝的“生态资源代际公平”理论,也被称为“地球资源的信托理论”。伊迪丝·布朗·魏伊丝在1989年的《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世代公平》一书中提出该理论,指出“在任何时候,每一代既是受后代委托而保管地球的保管人或受托人,也是这种行为结果的受益人。这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的责任,以及某种利用地球的权利”^[5]。该理论包括以下内涵:第一,地球上的生态资源是人类共有的财产,人类与人类所有成员,上一代和下一代应该共同经营好、管理好这些生态资源。之所以被称为“地球资源的信托理论”,就是意在人类每一代的成员都有义务珍惜地球资源,后代人所拥有的开发利用的权利“信托”给了前代人;第二,信托额财产不仅包括陆地上的

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还包括外层空间的国际公地;第三,各代人利用生态资源的底限是确保后代人拥有前代人相当程度的生态资源、生态环境和外层空间的国际公地,否则就违背了代际间的公平。代际生态和谐的内涵,对应了韦斯教授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与责任的法律原则时所归纳的“三个保护”原则。韦斯教授将“三个保护”原则具体表述为:第一,选择保护原则,即当代人应保护当代自然和文化资源基础的多样性的原则;第二,质量保护原则,即当代人应保持当代地球环境质量,使后代不至于继承一个条件恶化的地球;第三,使用能力保护原则,即每代人应为其成员提供公平使用前代遗产的权利并应为后代保护此使用权利^[6]。

种际生态和谐的理论基础是上文所述的“敬畏生命”、“土地伦理”、尊重自然以及环境伦理等生物平等主义的伦理观。种际生态和谐以生物平等主义的伦理观折射出的物种内在价值为前提,提倡限制人类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反对开发生态资源的绝对自由,因为那种无度的滥用只强调人的价值性,而忽视了物种的内在价值性。《中国自然保护区纲要》指出,生态规律包括物种相关规律、相生相克规律、负载定额规律、协调稳定规律、时空有宜规律。很显然,生态规律强调对其他生命物种内在价值的承认。种际生态和谐强调物种的内在价值性,并要求在遵循物种相关规律、相生相克规律、负载定额规律、协调稳定规律、时空有宜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类的立法理念曾经以“人类利益的中心主义”为主导,导致立法价值判断和设计完全一边倒,纯粹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而忽视大自然的需要;或者以“生态利益的中心主义”为主导,只讲大自然的利益,而忽视人类的利益。这两种立法理念都导致了人们在法律制度设计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利益是由“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组成的,这一观念的转变导致“人类与自然整体利益”逐渐成为俄罗斯等较早构建生态法的国家在生态立法价值产生嬗变,“人类与自然整体利益”成为俄罗斯等国家生态立法价值评判的新基点。无论是生态和谐观的思想渊源,还是其丰富的内涵,核心都是“人类与自然整体利益”。这种“人类与自然整体利益”的立法价值评判标准就是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生态和谐观的另外一种表述。因此,我国的生态立法应以俄罗斯等较早构建生态法的国家为榜样,以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生态和谐观为立法价值诉求。

2 维护人与自然生态秩序的生态安全观

在传统观念中,“安全”通常指的是军事上或者政治上

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或损失,体现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安全观认为,只要社会秩序稳定、国家安全,人类社会就能发展。然而,随着20世纪中叶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生态事件的爆发,以及20世纪60年代宇航员从太空拍回地球照片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地球之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种因为人们滥用生态资源导致生态秩序紊乱而引起的不安全。换言之,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以及人类社会整体生存安全的重要问题。这种认识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安全观,即生态安全观。

生态安全观最早由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提出。莱斯特·R·布朗于1981年指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概念将受到挑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安全’几乎完全是属于军事性质的。国家安全的定义就是假定对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其他国家。可是,目前对安全的威胁,来自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较少,而来自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可能较多,对很多国家来说,沙漠扩延或土壤侵蚀可能比入侵敌军更能威胁国家的安全。”^[7]在法律上较早提出生态安全概念的是俄罗斯。俄罗斯于1991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85条明确指出:“实施生态犯罪行为,即实施危害俄罗斯联邦的生态法律秩序、社会生态安全和对自然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的社会危害行为,并具有过错的公职人员和公民,承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规定的刑事责任。”^[8]

对于“生态安全”概念的内涵,有学者认为,生态安全首先指的是一种生态环境状态,这种状态要求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同时,生态资源环境的状态足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它是一种生态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社会发展不受生态环境资源的制约和限制;再次,生态安全是一种反映资源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持续性和长期性的状态^[9]。著名环境法学家王树义也认为,“生态安全”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种生态系统处于平安的、受到保护的状态。并指出这种状态具体的八种表现形式:生态系统的平衡得到维护,自然界的自然过程保持一种和谐状态;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再生条件得到保护;不可再生的资源备受珍惜和得到节约利用;自然界的环境容量受到尊重;环境的自然净化能力得到维护;整体自然环境处于良好质的状态;维持人的生命活动和健康所需要的正常条件得到保障;人的环境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8]。另一位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教授则认为,生态安全是指人类生态系统处于不受污染、破坏和威胁的安全状态。这种安全的状态指人类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生态系统处于正常的自然状态、不威胁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正常状态^[10]。此外,以巴瑞·布赞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

生态安全或环境安全基本都是涉及到人类和生物圈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存在基线^[11]。

综上所述,生态安全观涉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以及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平衡。它指的是人的健康、生命活动和整个生态环境或生态系统远离生态危机的一种不同于传统安全观的状态。因此,生态安全观是人与自然秩序的安全观,是以维护人与自然生态的秩序为目的的新安全观,是环境语境下人与自然生态秩序的安全概念。生态立法是生态利益分配的手段,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秩序的安全为终极目的。当前,从生态安全层面看,我国进入了生态环境高风险期,生态危机或生态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影响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生态立法如果要从立法层面解决生态安全问题和实现生态安全,要以维护人与自然秩序的生态安全观为价值追求。

3 兼顾公平和安全的生态效率观

生态效率观以功利主义法学派以及社会学法学为思想渊源。众所周知,功利主义法学派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边沁创立,并得到追随者的完善。功利主义法学派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法律良法与否的标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彰显的是一种功利;而社会学法学派主要代表之一的庞德提出社会学法学从事一种“社会工程”,目的在于实现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他强调法学家尽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使这些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均衡。功利主义法学派的功利思想,社会学法派的“社会控制”工程和社会利益观念,都隐含了一种效率思想。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在《21世纪议程》中首次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概念提到全人类发展的议程。在此背景下,生态效率概念在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向联合国提交的《改变航向: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全球商业观点》的报告中提出。该报告中指出:“提供有价格竞争优势的、满足人类需求并保证生活质量的产品或服务,同时逐步降低对生态的影响和资源消耗强度,使之与地球的承载能力相一致”。这一概念折射出生态效率的前提性,即生态效率是一种合乎地球承载力的效率,是生态资源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是产出与投入生态资源满足人类需要的合理比值。

我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自然资源量少并且现代化起点低的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我国于2005年提出“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表明,提高生态效率以满足我国人们的需要,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

(下转195页)

第二,促进工业循环经济发 展的措施。《规划》规定的创建新型工业体系,其实质就是工业循环经济体系。在工业中发展循环经济,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业资源的消耗和废物的排放,从而实现 对鄱阳湖环境(生态)的保护。发展工业循环经济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生态)保护的 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减少工业废物对鄱阳湖水系的污染;二是可以将过去那些污染鄱阳湖水系的废物(餐厨废弃物等)资源化,变废为宝,减少鄱阳湖水系的污染源,从而保护鄱阳湖水系的水质和生态。三是可以大大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提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促进现代服务业经济发展的措施。现代服务业经济由于其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因此发展现代服务业经济有利于生态系统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服务业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如果将现代服务业放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整个产业体系考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现代服务业占全区产业体系的比重越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生态经济就越发达,污染就越少,环境(生态)就越好。因此,必须立法促进其大力发展。

(4)提高地方立法技术。

立法技术是指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应体现和遵循的关于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的技能、技巧规则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包括立法结构技术和立法语言技术。从《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条例》出现的立法技术问题看,主要是立法结构技术和立法语言技术两方面的问题。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方立法应该聘请法律语言学专家和法理学专家参与地方立法,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从而提高立法质量。

综上所述,虽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为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而设立的,其建设已经启动两年多,但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制依然不健全,有待立法机关加以完善。我们期待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早日出台,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保护,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制保障。■

参考文献:

- [1]国家发展改革委.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EB/OL]. http://www.jx.xinhuanet.com/jxzw/2010-02/22/content_19070288.htm.
- [2]循环经济促进法[S]//司法文件选[G].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1~15.
- [3]陶良虎. 中国低碳经济[M]. 北京:研究出版社, 2010: 34.
- [4]齐建国.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83.
- [5]郭宁, 邹文彪, 邱佩君. 今年将出台法规保护鄱阳湖清水[N]. 江南都市报, 2010-01-29.
- [6]郭宁. 沿鄱阳湖实施生态移民[N]. 江南都市报, 2012-03-30.
- [7]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84.

(上接 190 页)

的生态战略。

如上所述,生态效率是一种生态资源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也是一种产出与投入生态资源满足人类需要的合理比值。生态资源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势必导致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的不和谐;生态资源过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秩序的生态不安全。提高生态效率有助于增进人类活动中的生态和谐和生态安全。因此,生态效率是生态战略中重要的价值追求。为此,生态立法应树立兼顾生态和谐与生态安全的生态效率观,应在坚持以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生态和谐观以及维护人与自然秩序的生态安全观的基础上,强调生态效率的法律价值。只有将兼顾公平和安全的生态效率作为生态立法的价值追求,生态立法的使命才能得以实现。■

注:

“八大公害事件”指的是发生于20世纪中叶的下列环境事件:1930年12月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1948年10月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20世纪40年代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1953年至1956年日本水俣病事件;1955年至1972年日本骨痛病事件;1968年3月日本米糠油事件。(参见余谋昌:《生态安全》,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14页)

参考文献:

- [1][美]罗斯科·庞德.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0.
- [2]李林. 立法理论与制度[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1.
- [3]曹明德. 生态法原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176.
- [4]曾建平. 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0-54.
- [5]爱蒂丝·布朗·魏伊丝. 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世代公平[M]. 汪劲, 于方, 王鑫海, 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76~77.
- [6][印]S·R·乔德赫瑞. 代与代之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权的基础[J]. 黄列, 译. 北京:环球法律评论, 1998(3): 10~23.
- [7]莱斯特·R·布朗. 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4: 289.
- [8]高全喜. 全球视野中的环境、资源、能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
- [9]李玉平, 蔡运龙. 河北省土地生态安全评价[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3): 784~789.
- [10]蔡守秋. 生态安全环境与贸易法律问题研究[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5: 1~2.
- [11][英]巴瑞·布赞, 奥利·维夫, 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M]. 朱宁, 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32.